

目 录

模范的大冶起义	程子华 白志文(1)
回忆宜昌、大冶两次兵变	石仲伟(16)
钟祥县土地革命时期的斗争情况	谢 威(20)
撤销汉口特一区管理局的经过	彭伯勋(28)
铁窗风雨	
——三年狱中生活与见闻	杨春波(34)
何恐烈士就义目击记	杜隆基(40)
民国前期的省议会及其它	李猿公(44)
关于湖北省参议会的片断回忆	胡楚藩(49)
三青团在湖北的组织与活动	梁上贤、田秉德(57)
湖北省保安团队的始末	方 瞰(73)
湖北省保警组织及其与军统的关系	
.....	刘绍向、胡 康(87)
李书城生平	李 枬(99)

忆伯父李书城的二、三事 李声馥(116)

我所认识的李范一先生 许子威(119)

大革命时期的鸿文中学 知真整理 (128)

武昌张楚中学纪略 邓 谷(132)

希达理女子中学的见闻 饶蓆华(136)

抗战前农村短期教育的情况回忆..... 朱 明(141)

回忆旧社会各时期湖北省财政概况

..... 沈肇年遗稿(145)

我在湖北官矿的见闻 张四维(151)

旧中国宜昌洋行的片断情况 冯锦卿(155)

屈子厚组织群众打死奸占民女的洋教士

..... 邹肇儒(161)

沙市教区美国传教士的劣迹 郑德清(163)

意大利传教士在圻州干的勾当 黄履昭(167)

老河口天主堂“生财有道” 艾伯镛(170)

竹山县同善社暴乱事件始末 郑桓武(172)

模 范 的 大 冶 起 义

程子华 白志文

〔资料介绍：本文系由武汉师范学院蔡树晖、雷正先两同志与阳新县党史编写组的同志一道，于一九八〇年八月访问了“大冶兵暴”的亲历者、现河北省政协付主席白志文同志；并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随同“大冶兵暴”的领导者、现全国政协付主席程子华同志到大冶、阳新实地参观访问。在此期间，程子华同志详细地介绍了“大冶兵暴”的情况。经蔡树晖、雷正先两同志整理成文，现予发表。〕

一九二九年的“大冶兵暴”，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的继续。是在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鄂东特委的直接领导和红五军五纵队及苏区人民的密切配合下取得胜利的。“大冶兵暴”也叫大冶、阳新起义，是分三批进行的。第一批是我（程子华同志自称，下同）领导的，第二批是白玉杰领导的，第三批是王愚领导的。

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后，党为了挽救革命，曾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开创了我党独立进行武装斗争的历史。在创建工农红军的同时，我党也重视了瓦解敌军的工作。当时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周恩来，对我们这些打入白军作兵运工作的同志，总是及时地、正确地给予指示，引导我们取得斗争的胜利。

一九二八年，我从海陆丰根据地回到北方，在河南驻马店街上遇到了武汉中央军校的党员同学郭炳，经他活动，我在岳维竣部队里找到了一个营部付官的职务。这支队伍原是胡笠僧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胡死后，就由岳维竣带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南路军，当时驻扎在河南确山城。岳部有两个特点：首先，这个部队原来就有我党的组织基础，刘天章烈士大革命时期就是我党在该部的党组织书记，多数官兵曾受到大革命影响，容易接受新思想。其次，它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被歧视和排斥，士兵生活异常困苦，军官又一再被裁撤。我到该部以后至兵暴之前就进行过两次大的整编。一九二八年冬，调岳部到江苏淮阴地区整编，把这支五、六万人的队伍缩整为新编第一师，大批的军官被遣散或降职。我所在的营，编为六团二营五连，营长降为连长，我当了排长。不久，已被降为师长的岳维竣，又被蒋介石以反冯玉祥不得力为借口撤掉了，换上了曹万顺。曹上台又带来了一批心腹——黄埔生，替换了原来的军官。一九二九年第二次整编，部队又由新编第一师改为独立十五旅，旅长换了唐云山，下面的各级军官又进行了一次清洗，甚至有些班长都换上黄埔生。我这次由于谎报为阎锡山学兵团毕业生而得以幸免。蒋介石如此露骨地吞併异己，必然引起官兵的不满。岳部的这些特点，有利于我们进行兵运工作。下面系统地谈谈我们如何在中央军委及周恩来同志指导下，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克服各种困难，终于成功地实现了“兵暴”计划。

还得从我来到岳部的时候谈起。一九二八年我到这个部队时，已经有好几个同志隐蔽在这里。如在山西被通缉的张维琿、赵振鑫（品三）和由潮汕来的杨持清等，有的当副营长，有的当政治教官、书记长。我们便一起进行党的秘密工作，团结进步分子和同情分子，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积极慎重地发展党的组织。一九二九年春，便有十四、五个连队成立了党支部，党员达

到七十余人。这期间党又派了郭子明、季步高、耿卓吾等到这支部队来。于是，一个巩固的战斗堡垒形成了。而且，在兵暴的全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它的战斗堡垒作用。

前面讲到，蒋介石对非嫡系部队极尽排斥、吞并之能事。一九二八年冬，第一次兼併时，我党的一些党员也被撤掉了，赵品三等成了编余人员，怎么办呢？正在无可奈何之时，中央军委及时给了我们具体的指示：要继续坚持和巩固党的阵地，千方百计地把部队掌握好。一九二九年初，部队被调到武昌南湖“整训”时，随着岳维峻的下台，曹万顺的上台，原来的军官又撤掉了一批，我党又有一批党员离队了。中央军委和周恩来同志又及时指示我们：要采取隐蔽精干的方针，积蓄力量，把党的组织保存下来，坚持党的工作，等待有利时机，争取这支武装。党的指示，为我们夺取“大冶兵暴”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但是，胜利的得来是走过一段曲折道路的。我们在宜昌遭到了一次失败。其经过是：部队还在武昌南湖的时候，被遣散出队的党员赵品三等与仍留在部队的党员，共同分析了部队的情况，看到士兵因生活太苦，待遇不公，思想很不稳定；反蒋反黄埔生的情绪蔓延全军。认为可以利用这种情绪，伺机发动兵暴。于是，密议了一个起义计划，并组织了起义司令部。不久，新编第一师被派到宜昌、沙市一带，去打反蒋的张发奎部。打头阵的一、二、三团进至鄂西就遭到张发奎的伏击而溃败，后续部队四、五、六团赶到时，张发奎已撤到了广西。于是，四、五两团便驻扎于宜昌、沙市地区，我所在的六团则驻在秭归。这时五团团团长王俊杰为了搞个人资本，想以老军官的身份，利用部队的反蒋情绪，实行哗变，把队伍拉出去当土匪。我党组织负责人发现王俊杰也想搞兵变，只考虑到他在部队中有一定的影响，打算和他共同发动，但没有认清和警惕这个敌人，轻率地对他讲了“兵暴当红军”的主张，结果暴露了计划。王俊杰抢先发动了宜昌兵

变，拉走了四、五两个团，杀了一批黄埔军官。我党组织负责人和我们一些同志如耿卓吾、季步高等也惨遭杀害。垂手可得的胜利因疏忽而丧失了。四、五两团兵变后，蒋介石怕六团也靠不住，于是下令六团从秭归开赴宜昌，刚抵口岸，就被蒋介石的“威胜”军舰严密监视，并且全体官兵被缴了械，徒手上岸。在宜昌住了一个星期，我们又徒手回到武汉硚口。蒋介石旋即部改编为独立十五旅。旅长换上了唐云山，连、排长以至有的班长也都被撤换了。这时，党组织负责人只剩下了我一个，党的力量极大地削弱了，处境更加困难。为了巩固党的阵地，掌握好部队，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当时有一个连长叫阎兆祥，他是团长的亲信，但和我的关系较好，又是同乡，我便利用他掩护我开展秘密活动。于是我一方面与二营三个连中的党员经常联系，同时与一营的白玉杰和三营的王愚取得联系，整理党的组织。另一方面又通过拉关系、交朋友，和连排长进一步接近，争取和团结革命分子及同情分子。由于我和党员们的共同努力，我们交了不少朋友，团结了不少同情分子。这样，就为实行兵暴打下了群众基础。

有了群众基础，还要选择有利的时机。恰好这时李灿、何长工遵照彭德怀“挺进鄂东南，建立新苏区”的指示，率领红五军五纵队来到了鄂东南。在他们到来之前，这里的党组织已建立了红十二军。两军会合后，鄂东南的斗争更是轰轰烈烈。国民党反动派对此恨之入骨，十月初，唐云山下令十五旅二团一、二营开赴大冶、阳新进剿红军，妄图扑灭革命力量，摧毁这块刚刚恢复的老苏区。但敌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如意算盘竟成了我们举行兵暴的有利时机。

第一批兵暴：当我听到我们这支部队要开赴大冶、阳新进剿红军的消息后，连忙跑到武昌一个小学，找到在该校当教员的赵品三。我告诉他队伍要开到大冶打红军了，并问他在那里实行兵

暴怎么样？赵说：“这真是一个好机会，那里有红军，兵暴后可以
把队伍拉出去与红军会合，这个条件比武汉好”。我们便商议了一个兵暴计划，并约定：今后通过地方党取得联系。

在这个关键时刻，恰好中央军委派石仲伟、柯乃康（庆施）、邓乾元等到武汉来找我。我立即把情况和兵暴计划向他们作了汇报。他们同意了我们的兵暴计划，并且商定：由石仲伟到上海向中央汇报，柯乃康、邓乾元到鄂东特委和红五军五纵队联系，然后再派人到大冶城找我接头。会面后，我把中央来人的消息和兵暴计划告知了白玉杰和王愚。十月初，全团开到了鄂东南，一营驻阳新，二营驻大冶，三营驻江北的团风。

十二月初，湖北省委派赵品山、郭子明、刘振山等送来中央指示：大冶中心县委协助五纵队瓦解敌独立十五旅。五纵队和大冶中心县委立即在曹家大垸曹玉阶家里举行扩大联席会议。参加者有李灿、何长工、陈奇、游雪程、徐策、李玉林、柯庆施、赵品山、郭子明、刘振山、吴致民、徐宁甲和阳新县委的曹大俊、曹玉阶等。会议决定立即与我联系。第二天，派了刘振山到大冶县城，通过商人李义甫与我接头。我连忙把刘带到一个小茶馆前，小声吩咐一个小士兵在外面放哨，然后才与刘同进茶馆。这个小士兵当时才十五岁，是我的得力助手，他就是后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应棠（一九八〇年逝世），我和刘一人泡了一壶浓茶，刘小声对我说：“中央军委已作出正式决定，同意你们的兵暴计划，特意派我来通知你”。我激动地说：“怎么干”？他说：“采取里应外合的方案，你在里面兵暴，红五纵队在外面打”。我说，“这个方案太好了”。便进而商量起义的具体日期，我说：“十二月十一日，是广州起义的日子，大冶兵暴就定在这一天吧！”刘计算了一下时间说：“十一日时间太紧了，红军要坐船过伟沅湖，来不及。但也不能拖得太长，以免发生变故”。我俩反复研究，最后确定十四日晚十二时起义。我们首先行动，红

军于拂晓时攻城。刘振山即时回去报告，我们便在党内外紧张地活动起来，准备起义。

十四号深夜十一时，红五纵队四千名指战员乘坐事先准备好的三百条小渔船，迅速地渡过沔沔湖，到了西岸的汪仁、王叶、四棵一带安全登陆。登陆后，第二支队插向大冶与石灰窑之间的牛角山颈一线埋伏，准备阻击石灰窑来援之敌。第一支队由李灿、何长工亲自率领担任主攻，隐蔽在大冶县城郊的山上，等待拂晓攻城。

与此同时，我把五连党员和班长们集合起来，公开揭出红旗：兵暴！当红军去！并规定：兵暴的记号是在胳膊上缠一块白布；兵暴的口号是：“打倒甘心替蒋介石做走狗的黄埔生”、“士兵不打士兵”、“工农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欢迎第二营的士兵同志们变红军”。根据兵暴的部署，我派出了几个得力的同志切断电线，接着动手解决反动军官。这时，连长和其他人正在睡大觉，根本没有听到兵暴的风声。同志们到了连部各房间，一枪未放，迅速地把连长、大排长、司务长和文书分别从被窝里拖出来，在他们口里塞上东西，用绳子捆绑起来，押到文庙绑在漏明柱上；对二排长没有动，我对他说：“今晚我要把队伍拉出去投红军，咱俩关系不错，我不伤害你。你愿意回去，我可以送你走。你若愿意兵暴当红军，咱们一块干。”在我说服下，他跟随我们参加红军了。（兵暴胜利后，这个排长当了我们的红军排长，一九三〇年打瑞昌时，不幸牺牲）五连的反动军官就这样干净利落地解决了。然后叫起全连的士兵，动员他们兵暴当红军去。动员后，我就部署了战斗：留一个班看守捆绑的反动军官；两个班去解决六连；两个班去解决营部。还剩下七连，我考虑要认真对付，因为它是新从一团调来的，连里没有党的组织，群众基础差，所以决定派一个排去解决。一切布置完毕，各支小分队由党员、班长率领分头行动。在行动中，由于天太黑，派到

七连的同志，刚刚摸到连部门口，恰好七连有个战士起来小便，碰倒了一个洋油桶，惊动了哨兵，哨兵一边打枪，一边喊：“共匪来了”！于是，七连便与兵暴部队接上了火。七连的枪声，又惊动了营部的敌人。兵暴战士刚刚冲到营部门口，解决了警卫班长，营长就拉了一部分队伍开始反抗。七连和营部敌人都跟兵暴战士接上了火，他们分别派人向我报告。当时，我考虑这样硬打下去，死伤太大，于是决定收拢队伍，把五、六两个连撤出县城，在城郊的一个山头上隐蔽了起来。

拂晓，红五军五纵和地方红军开始攻城，敌营长朱麻子见主力红军来攻，连忙带领七连逃跑。但被我红军阻击，全部缴械投降。我军俘敌百余名，缴枪五百余支，活捉了敌营长朱麻子和伪县长伍屏咳。兵暴部队同红军胜利会师，威震四方的第一批兵暴胜利结束。五纵队党委和大冶中心县委于胜利后立即在曹家大垸举行会议，决定红军扩编，由游雪程任一支队支队长，郭一清任政委，起义部队和部分俘虏编为第二支队，由我任支队长，陈奇任政委。郭子明、邓乾元为纵队政治部主任，柯乃康为政治部秘书长。大冶县委书记徐宁甲、阳新县委委员李吉士（程俊）调五纵队。队伍开往南山头、三溪口一带进行扩编。五纵队由一千多人（整理者注：据方步舟回忆，五纵队来大冶时只有四百余人）扩充到六千多人。

驻在阳新的一营，受到大冶二营胜利的鼓舞，很快地在白玉杰领导下，举行了第二批兵暴。

自从我在武汉把兵暴计划告知白玉杰后，他心情就异常兴奋，并积极地作着兵暴的准备工作。为了保证起义的胜利，他不计较职务的高低，自愿放弃排长的职务，到四班去当班长，以便开展争取士兵的工作。他抓住士兵严冬没有棉衣穿，一连几个月不发军饷，黄埔生出身的军官又任意凌辱士兵和下级军官，从而对国民党极其不满的情绪，利用放哨、外出、逛街、休息、吃

饭、问家常、代写书信、代请医生等一切时机去接近士兵，和士兵交心谈心。士兵们经过白玉杰的启发教育，认识到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扣发他们军饷、任意凌辱他们的是国民党黄埔生。所以士兵们非常气愤地说：“老子不杀死黄埔生牛连长决不罢休”！由于他作了艰苦细致的争取工作，全连一百多人，他已牢牢地掌握了九十余人，为兵暴创造了条件。

大冶兵暴胜利后，白玉杰立即召开了党组织紧急会议，决定十二月十五日晚举行起义。会议决定：白玉杰负责解决敌连长，担任全面指挥；刘和发及许瞎子（伙夫）两人负责解决几个顽固排长，然后拉走部队。

十五日的白天，白玉杰、刘和发、许瞎子就磨快了马刀和菜刀，还挑选了几个同情革命的士兵。深夜，许、刘走进卧室，趁敌人正在睡梦中，刘和发手起刀落，把反动的一、三班长的脑壳割下来了，接着，他又挥刀砍顽固分子二排长，那知，一刀没砍死。手脚快猛的刘和发未等敌人喊出声音来，又一刀刺进了他的肚子，结束了这个顽固排长的狗命。这时，很多士兵被惊醒了，刘和发一手持刀，一手拿枪严肃而低沉地通知大家：兵暴了，赶快穿好衣服，拿好枪到大院里集合。刘和发与许瞎子把已经集合起来的一、二连的士兵带出了城。

与此同时，白玉杰去找一班长孟宪立商量杀连长的事。孟宪立是一个老兵油子，老早就想把队伍拖出去当土匪，而且还笼络了一小部人。白玉杰对他说了要杀掉连长去当红军，他口头上表示同意，并自告奋勇地要去杀连长。他的目的是杀了连长好取得为头的资格，把队伍拉出去当土匪。白玉杰没有识破他的真面目，只是怕他手软杀不了连长而坏事，加之考虑到部队起义后全连的生活，遂谋中了连长的腰包，决定亲自去干。但对孟没有防备。白一刀砍断了连长颈上的一条筋，未死的连长嚎叫起来了。这时，反动的九班长孔庆荣（祝三）跑来救走了连长。白玉杰猛追

不放，未防备伪装进步的孟宪立会从背后向白挥刀砍来，白玉杰不幸牺牲。这时，由刘和发、许瞎子带出城的人，特别是一连的士兵，因没有见到白玉杰，有一部分人又跑回去了，只有二连和一连一部分人，由几个党员带领流奔于苏区，过了七、八天才在一位农民的引导下找到了红军。于是这八十多人的起义队伍正式参加了红军。

敌人在大冶、阳新惨败后并不甘心，十二月底，又将驻扎在江北团风的二团三营和直属旅部的重机枪连、迫击炮连、警卫连以及旅部，开往大冶县城，由旅长亲自率领，妄图对红军进行报复。可敌人又万万没有想到，三营在王愚领导下举行了起义，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第三批兵暴的经过是这样：当程子华在武汉把上级同意他们到苏区伺机起义的消息告诉王愚后，王也在积极进行兵暴准备工作。二营、一营起义后，三营从团风开到大冶，该营的党员不多，当时只有王愚和田文雅等少数人，都不是班长。他们团结了进步的班长邢长发、白志文，在起义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这批兵暴的参加者白志文回忆说：我当时在九连三班当班长，虽不是党员，但和党早有接触，心是向着党的。我记得王愚和我谈心的时候曾对我说过：二营五、六连在程子华领导下，起义当了红军，走的是光明大道。因为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是工农子弟兵，一切都是为着我们劳苦大众的，他们官兵平等，军民一家，不象国民党军队那样欺压老百姓，欺压我们士兵。我们也要像二营那样起义去当红军。我当时说：“那太好了，我坚决参加”。王愚就是这样通过交朋友、谈家常、关心疾苦等办法，秘密地作争取和团结士兵的工作。所以，在部队到达苏区之前，全连除连排长等几个顽固分子外，绝大部分士兵都被我们争取过来了，都愿意听我们的。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们到达黄石港，敌旅长唐云山给我们训

话，他说：“全体官兵弟兄们！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二团二营全体官兵都被共产党枪杀了（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了这件事的真相），我们要报仇，要到大冶去‘剿匪’”。唐云山讲这个所谓消息后，扫了士兵们一眼，看到大家毫无表情，接着警告大家说：“大冶这一带，老百姓都是共产党，赤化透了，他们知道我们要来‘剿匪’，在沿途水井里都下了毒药，我们绝不能喝生水、乱吃东西，否则就要被毒死”。妄图以此来煽动士兵对共产党、红军和苏区人民的仇恨情绪。

第二天，部队向大冶进发。这次敌人已吸取了前两次教训，变得更狡猾了，处处对我们严加防范。在行军途中不准我们讲话，连小解都要打报告。部队到了大冶城后，没有住城里，而是住在阳新方向城边的几个大庙里，防守也很严密，他们破例的在城外放排哨，再加上联络哨，并且还派九连中的顽固分子来监视我们的行动。

大冶县跟武汉、黄石港不同，因为这里接近苏区，县城里有我党贴的标语，如：“打倒蒋介石”！“分田分地”！“欢迎白军士兵和下级军官来当红军”！大冶的紧邻阳新就是苏区，连长叫我带人到阳新方向去放排哨，但敌人很不放心，暗地里派两个排长轮流监视我。

第二天，连部还是把我换回去了，另派二排的四、五、六三个班放排哨。党在这个排的工作未赶上，有些人还很顽固，特别是六班长，是个老兵油子，品质很坏。

二十九号，要准备过年了，我们没有一文钱，九个班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向连部要钱过年，但要了半天，才答应每人两毛钱。我提出到街上去买点烟、酒之类的东西，大家都同意，东西买回来后，除夕晚上我们以吃喝为掩饰，在一起商量起义的问题。我边吃边同八班长、九班长商量，准备把队伍拉走。正在这时，通讯员来说，上峰已下命令，明天六时开往武汉。我想开到武

汉就完了，要走也不可能了。当时，我们三个人都不是党员，研究不出个结果来。

晚上下大雪，王愚、田文雅等四个党员，乘人不注意偷偷地从放哨地点回来了，并把九班长、八班长和我叫起来，商量对策。王愚对我们说：“情况发生了变化，明天敌人就要把部队开往武汉，我们必须赶快行动，把队伍拉走”。会上决定当晚起义，并立即行动。会开得非常简短，刚一完，王愚等同志怕引起敌人怀疑，又迅速地回排哨去了。

根据会上的分工，一班长邢长发带领全班堵住连部。我当时把全班人一个一个地叫醒，打手势，叫大家走。这时一班已和连部打起来了，而八班长又站在门口大声叫嚷：“九连全部出来，兵暴当红军去”！接着又有人喊：“打倒蒋介石”！等口号，情况十分紧张。我便赶紧制止说：“不能乱喊乱叫，一喊不就等于告诉了敌人，赶快集合队伍跟我来”。我带着两个排往联络哨上跑，有七八个放哨的士兵，见有一支队伍向他们那里冲去，不知是怎么回事，于是慌忙开枪射击，我连忙上前喊话叫不要开枪了。由于我们事先作了争取工作，我一喊他们马上就停止了射击，而且全部参加了兵暴队伍。枪声惊动了前面的排哨，哨位上的二排长和三排长又十分烦恼，怎么办？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忙对着他们说：“排长，不得了啦，共产党把连长打死了”。他们一听慌了神，不知如何是好。我乘机带着队伍来到排哨跟前，忙把王愚拉到一边低声说道：“干掉他们”。王愚立即朝两个反动排长开了几枪，因为天黑没有打中。紧接着四个兵暴战士一齐开火，击毙了这两个坏蛋。然后，我们集合了排哨上的士兵，把队伍拉了出来。

部队拉出来后，即开往苏区。走到阳新、大冶两县交界的一个湖里，因下大雪到处都是白茫茫的，找不着路，也辨不明方向。加上跑得又快，有的战士把鞋袜都跑掉了。敌人发现我们跑

了，就跟在后面追。我们趴在雪地上听，听到他们在发号，知道敌人不敢追我们了，这才放心，一清查，我们一共拉出来了九十余人。

为了辨明方向，须要找一个向导，大家分头找，好不容易在湖边的草棚里找到了一个打渔的老乡。我们问他哪里有红军？到阳新苏区的路怎么走？因彼此说话不好懂，问了好一阵也问不出个结果来。有个士兵气了，踢了老渔翁一脚。我连忙制止说：“不能这样，红军是不打人的”。我又温和地对老渔翁说：“我们都是受苦出身，现在都不愿意为蒋介石卖命了，我们打死了反动官长，暴动出来找红军，请您给我们带个路”。老渔翁见我感情真挚，态度和蔼，便答应带我们去找红军。

我们在老渔翁的带领下，踏冰层、穿雪丛、过荒岭，走了二十多里路，到了一个大山脚下的小山村。我说：“不能再跑了，要搞清楚再走”。我们在这个小山村住了一晚上，一打听，才知道我们已经到了苏区，这里就是阳新县苏维埃政府管辖下的金龙区。

为了向红军学习，王愚和我要求士兵严守纪律，不要乱打枪，不随便拿人家的东西。这样，原来看到我们是白军打扮的队伍而吓跑了的老百姓，又都回来了，还安排了我们的住处。王愚组织人写标语贴在村子里，群众见了，知道我们不是白军，而是共产党的队伍，便主动地向我们送鱼、送腊肉、送粮食。特别是有位老大娘，见我们有的战士打赤脚，嘴唇都冻得发紫，便劈了自己保存多年的木材给大家烧火取暖，使我们深受感动。

第二天，来了两个年轻人，看样子很象学生。他俩问：“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我们回答：“暴动出来的，去找共产党和红军的”。他们说：“你们这样找是找不到的，得先派代表去找苏维埃政府”。“苏维埃，什么叫苏维埃”？我好奇地问。他们说：“苏维埃，就是人民政府，是共产党领导的，为人民办事的

政府”。他们还表示愿意给我们带路。这两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何长工同志。

大家一听非常高兴，我和王愚等几个同志一起商量派谁跟他们去。我提出派王愚和九班长温景慧去找苏维埃政府联系。因为王愚是党的负责人，温景慧出身好，人可靠。大家一致推我带领其他人在这里等待。

他们跟着两个年青人去了一天一夜回来了，说他们见到了区委，区委书记叫我们先交枪，再带队伍去。大家一听说要交枪，都不高兴了。有的说：“交了枪等于交了命，说什么也不能交”。我想了想说：“可能是问题没有弄清，还得去联系”。派谁去呢？我觉得还是他们俩人去合适些，我便对他俩说：“你们还得去，联系好了以后，王愚留在那里，九班长回来”。我怕王愚不同意，又对他说：“你放心好了，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不会丢下你的”。

第二天黄昏时分，九班长回来说：“王愚在区政府等着，区政府同意我们部队不交枪了，叫我们明天带着队伍去。人家说我们起义很光荣，欢迎我们去当红军”。

次日早饭后，我们带着队伍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向前开去，走了四、五里路的样子，突然从队伍中站出一个人说：“四班不走了，咱们是北方人，他们要交枪，咱们就回不去了，还是投到别处去吧！要不然，咱们先想办法每人搞二百块大洋再去投红军”！

我扭头一看，原来是吃喝玩乐、投机钻营的四班长杨振英。于是，我端着枪，站在路边的一个土坡上说：“我反对，我们暴动出来不是去当土匪，而是要去当红军”。我问大家同意不同意，大家齐声回答：“同意”。我说：“同意的跟我们走”。接着我叫八班长和一班长监督杨振英，自己便跨着大步，抢到队伍前头，八、九十人跟在后面，大踏步地向前走。我们通过一个村

子的时候，受到了隆重的欢迎。老百姓涌向村头，又敲锣打鼓，又鸣放鞭炮，还给我们送茶、送烟。我乘机向大家鼓动说：“你们看！不当红军，哪有这么多人来欢迎我们，不当红军，还想有人送烟你抽、送水你喝吗”？

下午三点钟左右，我们到了区苏维埃所在地。区委书记召集我们七个班长开会，表示热烈欢迎我们。说我们走的这条路是正确的。接着又把党的政策、红军纪律向我们作了宣传。会一散，我就迅速地把队伍集合起来，传达了区委书记的讲话，大家听了非常高兴。

开饭时间到了，在一个大礼堂里摆了八张大方桌，桌上摆满了鲜鱼、腊肉等佳肴，吃的大米饭，喝的糯米酒。我拿起筷子异常激动地对大家说：“这比过年还丰富，我们在白军过了两年，哪有这好”。“的确不错，在白军里哪是人过的日子”！一个士兵感叹地大声应着。

晚上，苏维埃政府办的列宁小学还为我们腾出了两间大房，铺着软绵绵的稻草，每人发了一床新被子。我们第一次睡上一夜舒服觉。尤其令人感动的是，睡觉之前，区委保卫科的干部对我们说：“到了苏区请你们安心睡觉，我们给你们守卫放哨”。我们这些受够了打骂、吃尽了苦头的士兵，第一次尝到了人间的温暖，很多人高兴得热泪盈眶。

天还没有亮，我们接到了红五军五纵队党代表何长工写来的信，叫我们把队伍开往花犹树。吃过早饭，我们高高兴兴地向花犹树开去，到了目的地，见到了何长工，他对我们说：“你们还要往前开，到阳新的三溪口再休息”。在三溪口，何长工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开了一个军人大会。散会后，给我们每人发了几合烟和五块大洋，又专门杀了一头猪给大家会餐。然后宣布我们正式编入红五军五纵队的教导队。我们换了衣服，正式成了光荣的红军战士。

经过士兵民主选举，一班班长邢长发被选为大队长，我和温景

慧选为中队长，八班长当选为司务长，王愚被任命为党代表。

整编后的第二天晚上，我、邢长发，温景慧和八班长等四个人，由王愚带到一个楼上，吹熄马灯，秘密入党。不久，我和另外两个人当选为支部委员。

我们从三溪口到燕厦，经过一个大镇，看见了很多人在欢迎我们。在这里，我们碰到了九连的老连长郭子明，在燕厦，我们又见到了程子华、赵品三等，一见面，亲热得不得了。过不多久，便在通山、阳新等地打土豪，在阳新打得最多，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此后，我们就跟随着彭德怀，沿着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奋勇前进。

大冶兵暴给了敌人以严重的打击，打得敌人不得不慌忙地带着残兵败将，灰溜溜地撤出大冶、阳新。

大冶兵暴壮大了我们红军队伍，红五纵队由挺进鄂东南时的一千多人，已经扩大到了六千多人。

大冶兵暴，为受尽人间疾苦的白军士兵争取自由解放树立了榜样。

因此，中央军委领导同志高度评价这次起义为“模范的大冶起义”。

（蔡树晖、雷正先整理）